

深读

建筑洋了
特色没了

时下,每个城市都在打造自己的“城市名片”,而每张“名片”都似曾相识。

记者在一些地方采访时,当地展示“城市名片”的方式几乎千篇一律———辆车把参观者拉到新开发的近郊新城区,新城往往整洁优美,豪华办公楼、会展中心、主题广场、体育馆、图书馆、规划馆、亮化美化工程,甚至高尔夫球场、度假村等,一个都不少。

“在城市化过程中,建设新城、改善城市面貌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城市化简单地理解为盖房子、建广场,片面追求华丽的外表,就会带来很多弊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说。

城市形象过度求新、求大、求洋,一些地方就大拆大建。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许多并未达到使用寿命的建筑纷纷倒地,代之以更为壮观的摩天大楼和广场。这样大拆大建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还时常发生野蛮拆迁、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

大型公共建筑往往投资大、土地资源利用率低、建筑能耗高,成为资金、土地、能耗的黑洞。一些城市不顾自身经济承受能力,急于建设华而不实的新城,加剧地方政府高负债的状况,进而加剧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形成了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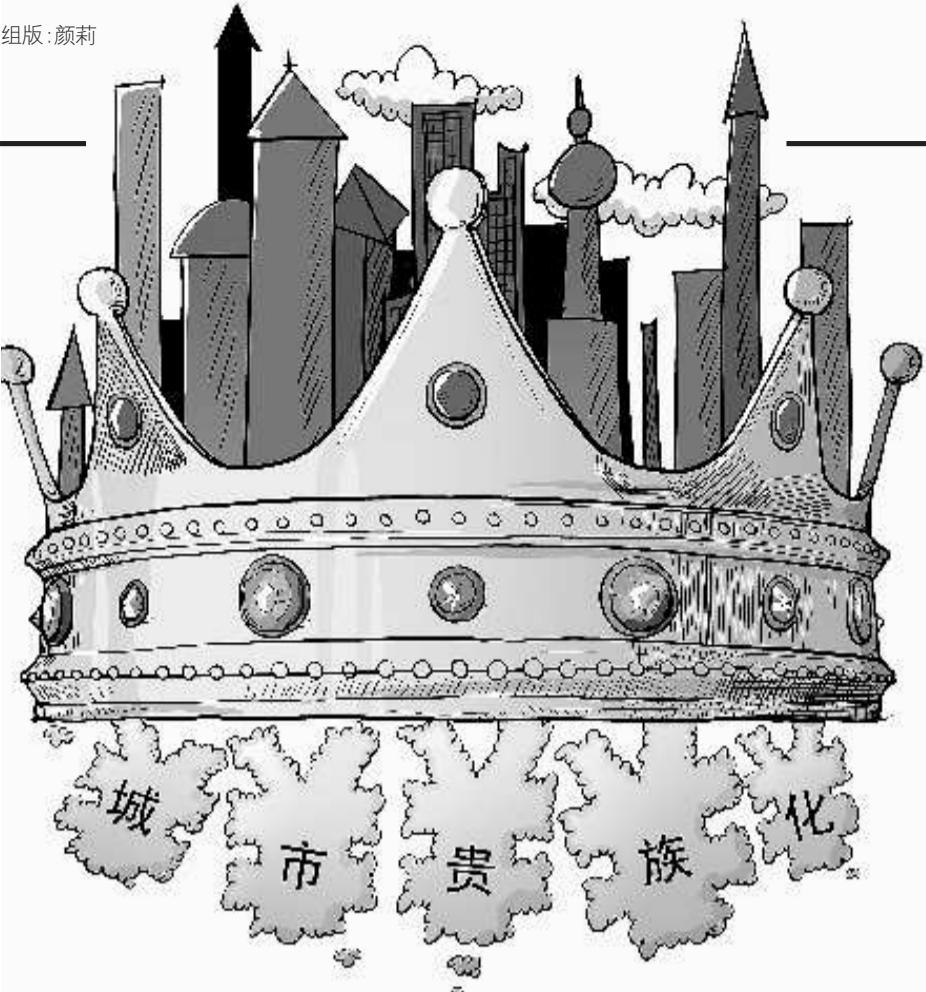
片面追求城市形象光鲜还会带来城市面貌单一化。“低头是铺装,平视见喷泉,仰脸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政府。”这几句顺口溜是老百姓对城市广场千篇一律样式的幽默描述。在许多城市,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对面通常是一片大广场,广场四周坐落着博物馆、会展中心、图书馆等建筑。而在这些同质化建筑拔地而起的背后,是一大批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旧建筑纷纷被拆,城市原有历史风貌被破坏。

档次高了
生活难了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今,城市变得漂亮了,但在一些地方,许多普通老百姓却觉得,生活没有变得想象中那么美好。

薛松林老人每天接送6岁的孙子上幼儿园。一路上,很多原来给人步行、骑自行车的地方,如今都停满了汽车,行人被逼到马路上。20分钟的路程,老人几乎一直拉着孙子的手,一旦身后有汽车的声音,他们便躲在路边,等汽车经过以后再走。“路修得越来越宽,但都是给汽车走的。过马路要走很远,行人走路没有以前方便了。”薛松林老人说。

老人觉得,这些年来,他生活的城市里给有钱人消费的豪华场所越来越多,理个发五六六十元,洗个澡一百多元,以前家门口就有的理发店、澡堂子却越来越少。孙子上的是一所“双语教育幼儿园”,每个月光学费就要四五千元。“好一点的普通幼儿园太难上了,没办法,只能花钱上这种贵族幼儿园。”老人告诉



求新、求大、求洋,百姓生活却不易

城市化出现 “贵族化”倾向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看到的是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贵族化”倾向。

一些城市热衷于表面繁荣、豪华的发展模式,忽视对百姓的服务功能,大楼越来越高,设施越来越洋,可普通百姓却感到生活不便、生存空间狭小。这种“贵族化”倾向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记者,一家人现在已经开始在为孩子上小学犯愁,要想上好一点的学校,花费可不少。

在不少城市,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等公共服务行业都出现了“高端化”、“贵族化”的倾向:一方面,很多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长期得不到合理的满足,例如,普通患者为了看病,需要花很长时间排队等候;一些城市的新区发展起来后,长期没有建设配套的中小学和医院,导致“上学难”、“看病难”;普通居民缺乏足够的体育活动设施等。另一方面,在公立医院中出现了很多高档病房,学校中出现了高收费的高档班级,甚至到公共体育馆打羽毛球也成了高消费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在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贵族化”倾向。一种类型是基本合理的“贵族化”倾向,就是由社会力量兴办的教育或私立的医疗单位提供的较高档次的服务。这种类型的服务,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高收入家庭或群体,很大程度上具有私人物品性

质。另一种类型是不合理的“贵族化”倾向,就是由政府举办的教育或医院提供的高档次的服务。这种“贵族化”使用的是公共财政资金、公共土地资源和公共人力资源,带有歧视性,应当加以限制。

徐宗威表示,要根据多数人的需要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大多数公共服务应该是开放式、公平、平等的,应根据不同类型人群的需要,确定不同的公共服务内容,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城市大了 “空间”小了

下午5点半,北京天色渐黑。刘文雄发完了今天带出来的房产广告,挤上一辆公共汽车,在晚高峰的人流和车流中,从慈云寺桥出发,沿着东四环,穿过繁华的望京,回到大山子附近的一处平房,这里是他的父母的家,一间50多平方米的平房,每月房租1100元。

22岁的刘文雄在北京长

大。十多年前,他跟着到北京打工的父母从河南农村来到这里,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又在廊坊一所学校读了中专。前年毕业后他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最近干起了在十字路口发房产广告的活儿。每一份传单上都有他的名字和电话,如果有人拿着广告买了房,刘文雄就可能有不少提成。但如果连续5天都没有客户拿着他的广告打电话咨询,饭碗就难保了。

刘文雄算是北京人,他对北京的一切都很熟悉。他又不算北京人,户口在老家农村,在北京没有社保,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

“我应该算半个北京人吧,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眼看着北京变得越来越好,但好像跟我的关系不大。”刘文雄说。

刘文雄的话道出了许多普通人的感受。城市越来越漂亮,但不少人的生存、发展空间却越来越狭窄。有些城市提出发展高端产业,限制小饭

店、小商店等低端产业发展,人们担心,这样的发展会使普通群众的生活更加不方便,也使普通群众的谋生空间更加狭小。偌大的城市,可以摆下无数高楼大厦,却难摆下一些菜摊。

在一些城市,对农民转化而来的“半市民”更是缺少足够的关怀和保障。随着城市化的潮流,每年有1000万—1200万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但他们以及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福利。

“城市化的完整含义应该是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让进城就业的农民在城市定居,并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进城农民不应该是身份上属于农民,职业上属于工人,也不应该是地域上属于城镇、职业上还是农民,更不应该是大规模、长期化、一代接一代的流动就业。

城市是 大家的城市

城市化中“贵族化”倾向的出现,首先是利益因素及其背后根深蒂固的GDP崇拜。中国城市国际协会会长罗亚蒙认为,城市化中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农村流转土地的开发,背后都有房地产和工业开发的身影,通过迅速开发土地,能够为地方政府换来可观的土地收益。

其次,和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不无关系。地方政府要展现城市化的成绩,除了统计数据上的城市化,最直观的展示方式就是新城,而且城市之间会出现攀比。

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决策者有必要想一想,城市化究竟是为什么,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贵族化”的道路一定不行不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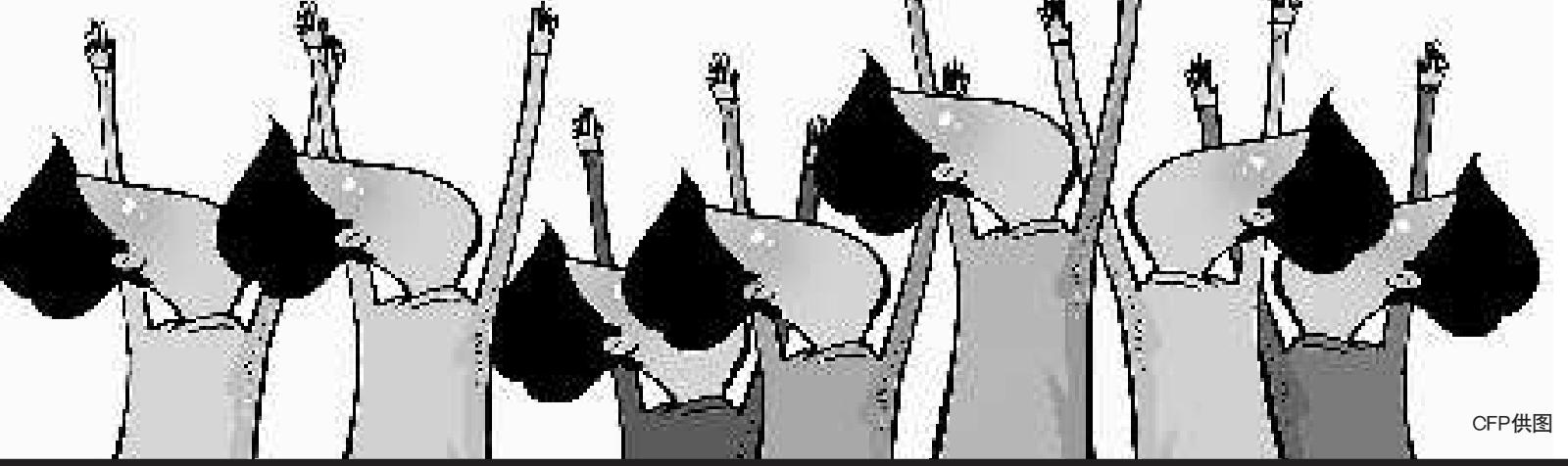
“城市是大家的城市”,罗亚蒙认为,随着城市的发展,一定会有阶层的划分,但占大多数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城市化的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为不同阶层都提供公共服务,让广大市民而不仅仅是少数高端人士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美好生活。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认为,城市化道路要以人为本,必须构建一个民主科学的决策平台,让广大市民能广泛参与到城市发展的规划与实践中去,使城市由人民自己来建设。如今,被各地广泛采用的听证会制度和城市发展规划征求民意制度,已经开始体现这种“为人民建城市”的思想。

徐宗威强调,必须认识到,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不仅是城市人的城市,也是农村人的城市,要特别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实现。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大任务。专家建议,各地应编制农民市民化的一揽子计划,可采取放宽落户条件的方式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市民化,逐步将他们纳入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

据《人民日报》



全透视